

安徽合肥蜀山区一小区38位老人志愿捐献遗体——

“你看奶奶眼睛这么亮，能救好多人”

编者按

医学界将捐赠者的遗体称为“大体老师”。通过解剖大体老师，医学生们第一次划开了人体皮肤，第一次分离神经，第一次看到血管和骨骼的模样。

沉默的大体老师不仅为这些未来的医生们上了临床课，也上了一堂生命课，诠释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每一位“大体老师”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都有一个值得尊敬的家庭。

事实上，尽管遗体捐赠者逐渐增加，但

相对于医学教学和科研来说依然有限，国内许多医学院是十几名医生用一具遗体，窘迫的院校只能老师解剖学生看，而理想状态则是4到6人一组，有的医学院甚至需要购买遗体标准或模型才能完成解剖课。

社会尊重每一位逝者及其家属的选择。不过，人生一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化为一缕青烟。在有限的生命结束之后，再做一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也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为邮电新村小区里的第一个遗体捐赠者。

去世前一年，病房里的吴朗决定捐献遗体，家人都很尊重，“我们一家都是党员，没人反对。”在吴朗的老伴马毅兴看来，这是一个唯物主义都应该算清楚的“明白账”，“火化了不也是消失不见了？捐出来还有点用处”。

吴朗的遗体捐献，现场没有隆重的追悼会，只有病房里简短的告别仪式。马毅兴说：“就像滴进生活里的一滴水，一丝涟漪也没留下。”因为，当年遗体捐献太过“前卫”，大家心照不宣地没有张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场“集体遗体捐献”的开始。

2006年，马毅兴签字申报了遗体捐献。“光荣嘛。”每当有人问她为什么，她都这样回答。受吴朗夫妇的影响，远在北京工作的女婿，也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行列，外孙女经常说：“外公外婆和爸爸都是好样的！”

吴荣坤是和马毅兴在同一天登记捐献的。吴朗去世后，马毅兴找到邻居吴荣坤提及，吴荣坤也有捐献的念头，便一起前往安徽大接受站打听情况。“我们都受吴朗的影响，我向他学习。”吴荣坤说，工作时的吴朗是他的领导，但没有架子，有苦累的活儿往往带头上。

2013年，邮电新村小区红十字爱心社正式成立后，吴荣坤担任小区遗体捐献联系人，被老人们尊称为“社长”。吴荣坤的老伴汪桂兰退休前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明白遗体对于医学的重要性，不仅自己申请捐献，还发动很多同学加入进来。在他们的印象中，2012年以后，小区里捐献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而遗体捐献也逐渐被更多人谈论。

“正视生死，没什么可怕的”

陈清秀和老伴朱秀芳，在2009年签字申请捐献。2013年陈清秀去世，实现捐献承诺，但这却为老伴招来一些闲言碎语。

小区里有人议论朱秀芳“太狠心”，怎么舍得捐献老伴遗体，她假装没听到。她曾一步不离地在医院陪伴老伴一年多，当时老伴几乎没有意识无法进食。医生劝朱秀芳放弃，但她坚持给老伴注射流食，吸痰，两小时翻身，伺候排泄，一直到最后。虽然两个女儿也经常过来，但她既心疼老伴也心疼女儿。“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有一堆事”。

陈清秀晚年患上老年痴呆。两个女儿一再劝说不要捐献遗体，甚至让步说同意捐献眼角膜。“我没同意，研究老年痴呆患者大脑出了什么问题，只捐眼角膜没法研究大脑啊。”朱秀芳也理解女儿们，“谁会看着父母捐献而无动于衷呢？”最终，女儿们同意了。

登记捐献的老人们，大都有和朱秀芳类似经历。邻居的议论、亲人的反对，一度让他们只敢私下讨论。

吴荣坤见证了遗体捐献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变化的过程，“有人不想捐，也有人想捐不知道怎么捐”。为了便于让人知晓这件事，他设计了宣传单，张贴在宣传栏里。

今年81岁的张润芳年轻时就患有心脏病，44岁安了心脏起搏器。她是捐献的坚定支持者，“如果对我的身体进行研究，让心

脏病患者少受罪，那就算我做了贡献。”67岁的叶伟真考虑除了捐献遗体，还要捐眼角膜。“小孙女哭着问我，为什么奶奶要把眼睛给别人。我哄孙女，奶奶去世后，你看奶奶眼睛这么亮，能救好多人。”

今年92岁的周凤翼是邮电新村小区爱心人士成员里年龄最大的，他说：“如果能正视听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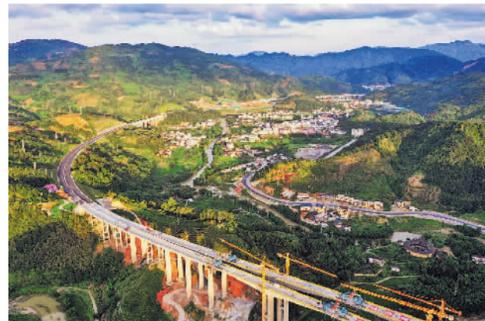
从1个到11个：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了

安医大接受站于2002年12月25日成立，在那之前，付杰一直在从事遗体捐赠相关工作。他见证了遗体捐献“从无人问津到每年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增长的变化”。

“类似邮电新村小区这样的红十字爱心社在安徽已经有了11个。邮电新村小区是第7家，也是捐献人数最多的一个小区。”付杰说，关键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了。”有的人捐献是为了“给国家省土地”“给医疗事业做贡献”，有的人是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还有的老人填表后如释重负，感觉“身后事”安排好了，心情轻松很多。

如今，安徽全省每年遗体捐献在100例左右，安医大接受站实现接受捐献约在60例。2012年以后，青年人捐献的比例在上升。合肥市大蜀山文化陵园内有一块专门为全省遗体、器官、组织捐献者设立的纪念碑。纪念碑里有一个塑像，红色大理石中镂空出男人和女人的身形，从塑像镂空处看过去，透明人形后边就是填满捐献者名字的石碑。石碑展开几页，上面的姓名密密麻麻，排列整齐。

安徽医科大学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去这里祭奠。在每年的开学典礼上，学校都会特别强调，师生在解剖课上要向大体老师三鞠躬。“现在流程要完善得多，相关手续要求也更规范。”付杰说，“随着思想观念改变，我相信未来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



书洋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

近日，由中铁十六局集团承建的福建省“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漳武高速重难点及控制性工程书洋特大桥主桥提前20天安全顺利合龙，该桥是全线首座合龙的跨度桥梁。漳武高速建成通车后，往返于永定土楼、南靖土楼及云水谣古镇等景区，将缩短约1个小时的车程。 许鹏健 谢成摄

G 民声

网上网下，自己说的话都要负责的

罗筱晓

近日，已去世近5年的艺人乔任梁的名字又出现在了社交平台热搜榜上，但却以一种让人既意外又心酸的方式——他的父母很长时间里都在遭受网络暴力。

2019年，乔任梁的父母开通了短视频账号，一方面分享自制的美食视频，一方面为儿子生前创立的品牌做一些宣传。可就是这样一种没招谁惹谁的举动，却引来了少数网友的言语攻击。有人挖苦他们的外形，有人怀疑他们的动机，还有人质问他们“儿子都没了，怎么还笑得出来”。

如果是在真实的生活里，但凡是个正常人，应该很难对两位素未谋面的失独老人说出如此恶毒的话。然而，因为有了网线和屏幕的庇护，某些人将“自由评论”曲解为“放肆评论”乃至“恶语评论”，网络暴力由此产生。

凡是我喜欢的就是不该存在的，凡是“我觉得”的就是“真实的”，网络暴力是互联网戾气的一种集中体现方式，乔任梁的父母只是这种无形暴力的诸多受害者之一。留日学生江歌被害后，坚持为她讨要说法的母亲江秋莲长期遭到网友言语攻击；2018年，四川一位女医生与两位未成年人发生冲突后遭“人肉搜索”和网友谩骂，因不堪压力服药自尽。讽刺的是，随后，网友又调转矛头对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展开了攻击。

网暴，就像一把藏在暗处并且装了消音器的枪，施暴者每敲击一次键盘，枪里就射出一颗子弹。这些子弹方向随机，站在明处的被施暴者，防不胜防，无处可躲，甚至可能被一击致命。

没敢网暴的子弹，是营造健康网络环境的关键步骤之一。有大V在刷到对乔任梁父母的恶评后，专门制作了一条视频为他们打抱不平。乔任梁生前的粉丝则早早自发成立了“黑粉巡逻队”，在乔爸乔妈视频的评论区回怼恶评。几天前，乔爸乔妈也做出回应，感谢善良的网友，并表示不会因为少数刺耳的声音放弃正在做的事情。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日益完善，对网络暴力行为的处罚正日趋严厉。今年4月，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宣判，两名被告犯造谣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两年；8月，四川“女医遭网暴自杀”案宣判，3名被告以侮辱罪分别被判刑。

当代社会，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人们都可以表达喜恶和不同观点，但这种表达需要建立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和符合公序良俗的基础上。网络不应也不能成为滋生言语暴力的温床，“黑粉巡逻队”也好，越来越多的案例也罢，都在警示少数习惯了不问青红皂白随意在互联网宣泄情绪的人：不管在哪儿，自己说的话，都是要负责的。

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达7万多只

本报讯(记者那生祥)记者日前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管理处获悉，今年的藏羚羊迁徙季已结束，共记录到3874只藏羚羊进入可可西里产崽，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达7万多只。

可可西里，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被誉为“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基因库”。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栖息在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及青海三江源和可可西里保护区内。上世纪80年代，藏羚羊在可可西里遭到大规模盗猎，数量从20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目前，可可西里保护区境内及周边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达到7万多只，保护等级也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



大自然里的“第一课”

在位于广东的观音山，孩子们在自然课堂中开启新学期“第一课”。孩子们走进森林，通过与森林生态环境零距离接触，认知各种动植物，感受“地球之肺”的作用，有助于提升环保意识。 张毅摄

“我在高风险地区当志愿者”

本报记者 周峰 本报通讯员 丁大雷

“我在高风险地区当志愿者。”从8月17日到9月3日，中石化经纬华东录井分公司员工章黎腾已经为所在居民小区志愿服务了18天。

章黎腾所在的小区位于江苏扬州的市中心，隔壁小区就有确诊患者，因此这片地区被列为高风险地区。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在小区居民群里及时发布信息、宣传疫情防控要领、解答居民疑问，二是每天下午定时在小区门口执勤，严控居民出入，三是每天3次分发派送居民订购的生活物资。

章黎腾每天出门“全副武装”，手套、口罩、面罩一样不少。8月的扬州，正是暑热时节。分发生活物资是最累的事，小区六七百人一天的吃喝，几百件物资全靠志愿者肩扛手推车推，一件件要分清派清楚、运送到户。

“大部分的居民还好，很多事情手机群里就能顺畅沟通。上年纪的老人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就必须点对点服务。张阿姨就是这样。”章黎腾说。张阿姨是独居，孩子不在身边。他每天询问张阿姨需要些什么，在网上订购。

物资到了后，他运到一楼电梯口就给张阿姨打电话，通知她在电梯旁等着拿取，直至确认收到。张阿姨每次在电话里都不住地说谢谢，这让章黎腾觉得当志愿者“值了”！看着疫情一天天缓解好转，他感到曙光就在眼前。



南京撞响和平大钟 纪念抗战胜利76周年

9月3日，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撞响和平大钟。当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师生代表、媒体代表等12人参加撞钟仪式，大钟撞响13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快递员罗书坚推着脑瘫的儿子跑了52场马拉松比赛

逆风的人生，我推着你飞奔

本报记者 邹佩然 本报通讯员 徐健辉

“就像你永远都不可能叫‘爸爸’一样，我知道，你永远都不可能去读这封信，但是在我心里，我还是有很多的话想和你说，希望你能记得这12年来我们一起奔跑的日子，记得这些日子痛苦、挣扎和快乐”。

这封信，是来自浙江金华的快递员罗书坚写给自己儿子小柏的。从2015年杭州马拉松开始，他推着脑瘫的儿子全国各地参加了52场比赛，成为赛场上的一道风景。“每天早上，我帮小柏起床，喂他早饭；每天晚上，我回家，小柏都会扑到我怀里”。

“他是个特别的孩子”

“小柏，他是个特别的孩子。”每次谈起小柏，罗书坚的眼中总会闪烁着同样的光芒。小柏刚出生就患上严重的缺血缺氧性脑病，6

个多月被确诊为脑瘫。2岁半时，原本就智力停滞带有自闭倾向的小柏开始癫痫，每天都会摔倒十几次，最终被确诊为“LGS综合征”，这也是儿童癫痫中最难控制的一种。

“小柏不断加重的病情，让我感到过压抑和难受，但转机也很快到了眼前。在公益机构的帮助下，我带他见到了权威专家，使用对方推荐的进口药物，小柏真的好起来了”。在癫痫症控制之后，罗书坚踏上推着儿子跑马拉松的传奇之路。从2015年杭州马拉松开始，半马、全马、铁人三项，小柏爸爸带着小柏向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看起来不可能的距离冲刺。

“没有小柏，我没有自信站到跑道上，我发现我推着他跑得越多越快，他的笑容越开心”。小柏近年来因为耐药性关系，癫痫症又有发作，罗书坚除了拼尽全力工作，赚更多费用来求医问药，就是带着儿子走出家门，多看看多驻足。走进罗书坚的家里，所有桌角都被包上了海绵，还有专门的小护栏

围出一片天地。这一切都是罗书坚和爱人精心设计的，为了让小柏在家里少些磕碰，玩得自在。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奔跑

很多医生都告诉过罗书坚，要做好心理准备，小柏的病太特殊，他可能只能停留在一岁多的智商和认知状况，他在10岁后就不能不认识父母。可是，小柏12岁了。罗书坚和爱人每次回家，都能看到那个满脸微笑，扑到他怀里的孩子，他觉得，这也算跑步带来的小奇迹。

为了生活，每天罗书坚都要送出100多件快递，还要为孩子的医疗费、生活费精打细算。有朋友和罗书坚打趣，大小也是个网络名人了，靠名气就能赚钱了，何必那么累。

罗书坚却执拗地认为，自己的影响力应该献给公益。“我不仅仅是小柏的爸爸，我那点影响力应该全部献给星星的孩子们。至于

生活，靠我和爱人打拼，还能活下去。”

从2016年开始，“小柏爸爸”参加在金华组织的自闭症儿童公益活动，这一坚持就是5年。“4月2日世界自闭症关注日，我带着孩子们跑过湖海塘公园，看过兰溪的美景，跑过北山的鹿女湖，进过美丽的小学校园”。

今年暑假，闲不住的罗书坚又开设了公益跑团，每天他带着小女儿，陪着10多名孩子一起在清晨奔跑，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加入了进来。“有的是看了我的朋友圈，有的是听了女儿的讲述，反正跑的孩子越来越多，我就干脆成立一个跑团，带着孩子们一起跑”。

下半年，罗书坚计划继续报名参加马拉松，只要小柏身体允许，他会继续推着12岁的小柏迎风飞奔。罗书坚还计划明年继续组织自闭症儿童的公益活动，他说不知道自己坚持多久，只是希望能看到更多星星的孩子的笑容，让更多人理解和关爱他们。